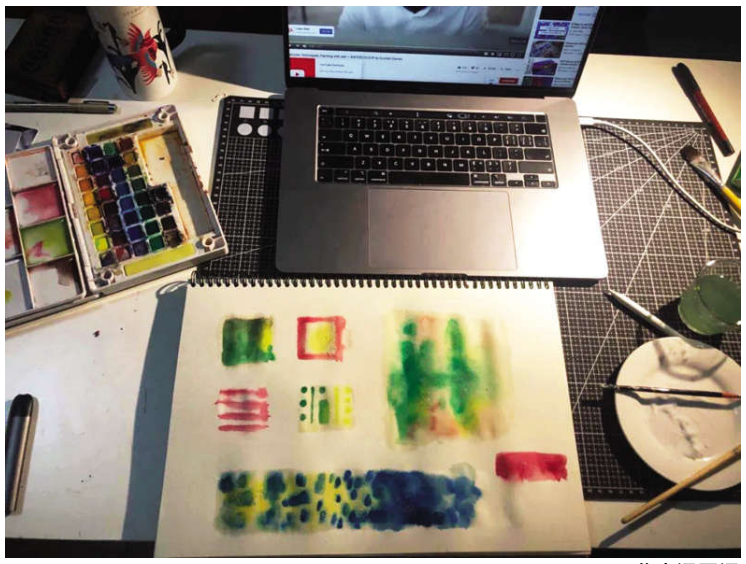
上网课的中国留学生们

□ 陈明辉

留在家里上网课

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——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、调休和年假,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,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。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,他们拿到了理想的入学通知,却由于疫情、签证和旅行限制,被留在了家里。

刚刚到来的开学季,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,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。他们只能上网课,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同学一起,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、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。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。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,一个介绍,一个提问,一个互动,现在都困难重重了。



艺术课网课

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,累、焦虑,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。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,“早安,一天开始了”,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,“下课了,准备睡觉,晚安”。

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,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。长久过纽约的时间,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。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,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,老是睡不踏实。而要上早课的时间,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,烤几片面包当早餐,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强迫自己醒神。

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大一新生,刚刚满18岁。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。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,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。

同龄人中,她是那种“按自己方式穿衣”的女孩,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。

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,叫人猝不及防。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,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,画面卡了好几次,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。这节课开始前,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,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,她说,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,那是她的室友,请大家不要见怪。

有时候,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。ZOOM——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,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。她冲着耳机听筒说:“我来自中国的北方,现在晚上十点半。”重复了三遍,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。

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。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,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。电脑屏幕上,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,没有学生进入,有人给老师带话,“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。”

老师说:“谢谢你,我知道了。”

关于空间的概念,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。网课上,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。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,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,“住在纽约的皇后区,走10分钟就到了”。若羲无法理解“皇后区”意味着什么。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,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。

选择学校时,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,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。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,第50多个的时候,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,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。那有很多买手店,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,有很多“穿得奇奇怪怪”的人。她想象着,自己也可以“穿得奇奇怪怪”的去玩了。她对纽约的期待,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。

出国读书的理由

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,开阔的视野、更好的前途、不同的文化……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。

比如,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——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。今年九月,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。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,是她仔细挑选过的“有冬天的城市”,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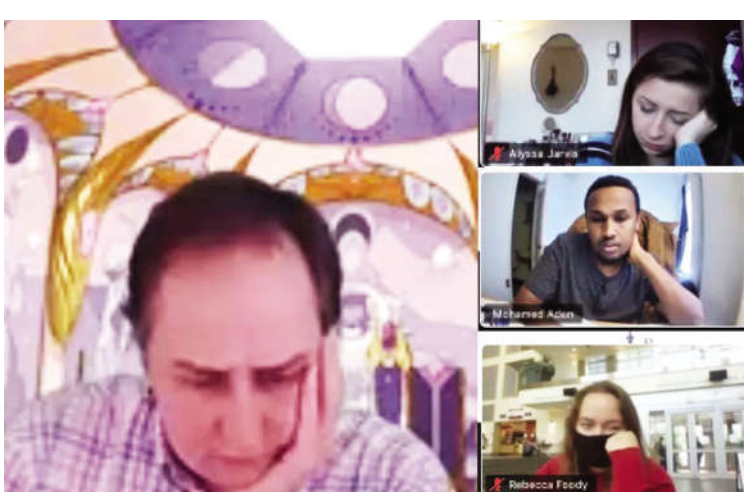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在高中的时候,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,那是个“特别烂”的球队。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,她都不在乎,她就是想踢足球。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,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。现在,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,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。

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。通过邮件,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。有时候是隔几天,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,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,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,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——若羲收到过一个派对邀请,但她并没有参加,“对着镜头派对,无聊”,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,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。

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。之前的新生破冰日,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,她只参加了一个。再往前的开学典礼,她干脆直接缺席了。

9月22日,一名大三校友去世,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,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,欢迎大家加入,送他最后一程。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,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。

另一位大一新生,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。她想了半天说,“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,但视频缓冲不出来,我就删掉了”,她对此并不在意。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,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,作为短期的过渡,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。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,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,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,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。



网课里的老师(左)和同学们(右)

大二学生朱成林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,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,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,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。

但朱朱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,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。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,朱朱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。

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,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。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,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,“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,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,大家都托着下巴,很少人发言”。

可能是熬夜的原因,朱朱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,“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,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,我吓坏了,以前从来不会这样”,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,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。

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。朱成林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,一共30个学生,其中亚裔有3人,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,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: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。还有一部分课程,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,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。

政策的变化

一些辗转多地,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。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。双边隔离,加上等待面签预约,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,“有人签到了”、“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、再入境美国成功了”,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。“但他们也劝说,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,折腾完挺累的”,一个母亲说。

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。“早上一睁眼,刷完牙,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,睡觉前又再看一遍,每天都在重复”。

一次次的失败,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。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,网课远远满足不了,本来三小时的课程,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,实验步骤被略过,老师直接给数据,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,“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”。

最初的那段时间,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。有一天中午,她正在外面吃饭,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,“广州领事馆开放了”。她站起来把碗一放,拔腿就往家跑,路上把脚崴了,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,结果还是没约上,“很难受,很难受,很失望”。

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,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。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: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,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,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。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。7月8日,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,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,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。这种不确定的氛围,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。

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。他们突然意识到,那个稳定的、可以预期的世界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,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,有的还在继续等待。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,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,全部改为线上教学,不到最后一刻,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。

在这个特别的年份,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。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,决定放弃入学,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;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,选择休学一年,回国创业开工作室;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,现在他留在中国,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。

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。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,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,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。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。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,今年18岁,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,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。

(选载自《谷雨实验室》)